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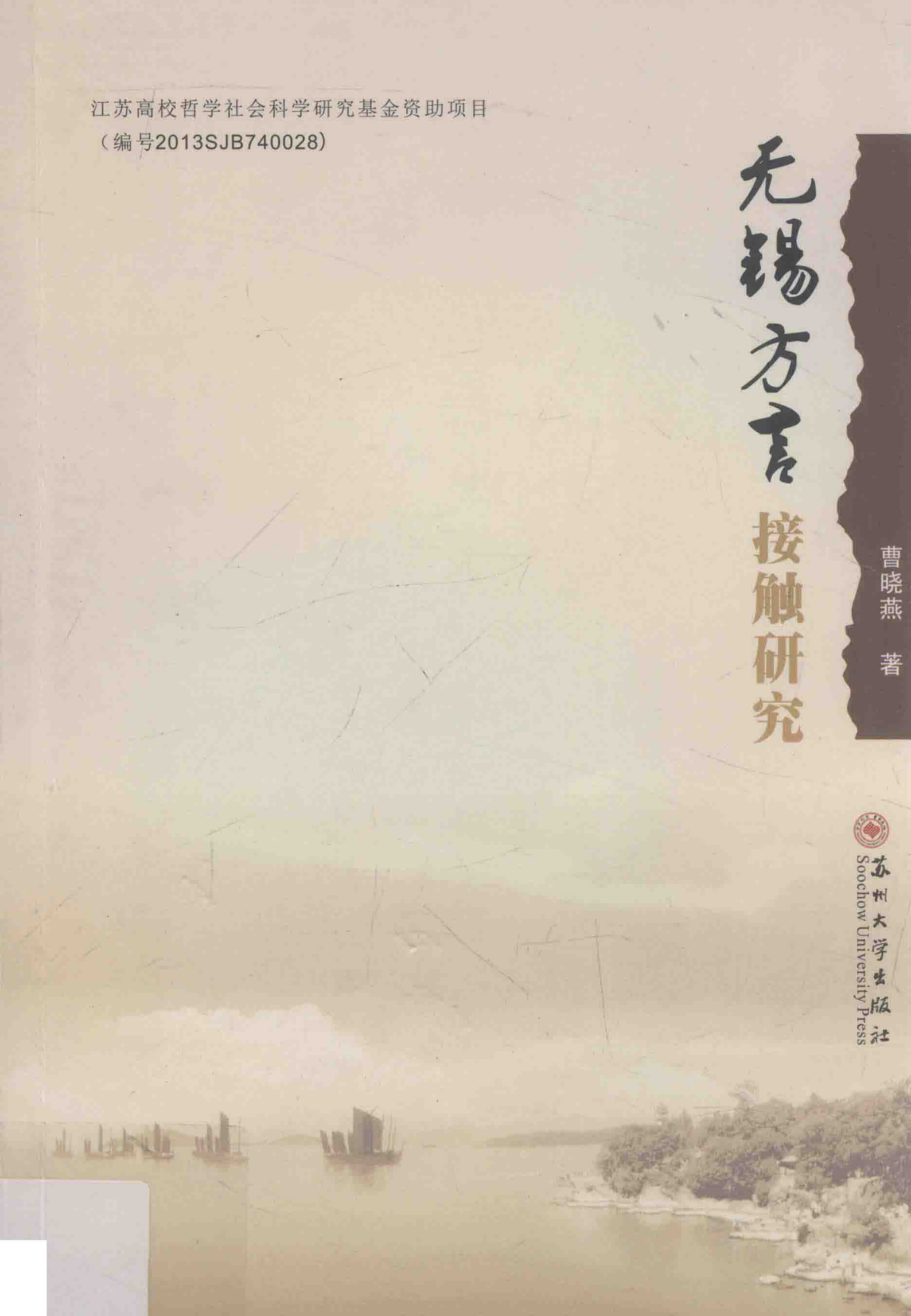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2013SJB740028)

# 无锡方言 接触研究

曹晓燕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本课题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2013SJB740028)

本书由苏州大学“211 工程”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 无锡方言接触研究

曹晓燕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锡方言接触研究 / 曹晓燕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7

本课题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3SJB740028)

ISBN 978 - 7 - 5672 - 1333 - 3

I. ①无… II. ①曹…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无锡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0583 号

书 名: 无锡方言接触研究

作 者: 曹晓燕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http://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2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333-3

定 价: 4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 序

无锡是沪宁线上的繁华都市，居苏锡常之中。让人极有兴趣的是，无锡方言保留着较多吴语的早期特征，比如分尖团、保留舌尖后音声母等。无锡在地理上跟东西邻苏州、常州几乎是等距离的，但是，在苏州人耳朵里，无锡话像常州话；在常州人耳朵里，无锡话像苏州话，而无锡人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更接近哪一边，这实在令人十分好奇。

这些现象都凸显了无锡方言的重要研究价值。但以往数十年，相对于苏州方言和常州方言而言，对无锡方言的研究还不多。所以，曹晓燕的研究可说正当其时。晓燕是正宗的无锡城里人。她学习优秀，硕士生学习就得到石汝杰教授的指导，打下了语言学、方言学的良好基础。当我调入苏州大学，赶上参与评审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时，发现文章对无锡方言各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描写得十分妥帖，尤其对复杂的连读变调现象的处理更见功夫。这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理所当然地给了“优秀”的评分。

此后又有机缘接在汝杰兄之后，指导晓燕的博士生学习。

传统的方言研究，假设方言是不变的。这不仅因为处于初始阶段的研究只能从静态语言做起，也因为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发展不快，语言发展也不快，对静态方言现象的捕捉不太困难。随便上街请问几位当地人某字的读音，往往十分一致。但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如此，方言也如此。今天再上街请人发音，请问几位，可能就会有几种读法，还会有人回答你：我只知道普通话读音，不知道方言读音。这不仅给我们方言工作者出了大难题，不得不另想捕捉静态方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不能对这动态的方言现象置若罔闻。我们的语言研究不是经院哲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社会上出现什么样的语言现象，我们就应该研究它。同时，所用的理论方法也应随之跟上，在传统方法基础上，利用和探索新方法，多种理论结合，以适应新研究，获取新成果。晓

燕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在静态研究的扎实基础上,观察和研究近几十年无锡方言在普通话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无锡口音普通话的研究。

研究动态的方言现象,首先,调查方法就不同。传统的拿着《方言调查字表》,跟发音人对坐,口问笔记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需要设计新的调查表和调查方案,充分利用本人对目标方言的深入理解,寻访相当数量的发音人,(简直是多多益善!)搜集各种自然状态下的动态话语材料,从中汲取各种语言元素,以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理论为指导,以实验语音学方法为工具,进行深入、精细的分析研究。

本书不仅将无锡方言这个重要的地点方言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填补了吴语太湖片中心位置的一片空白,更对语言接触、语言演变,以及中介语等相关语言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中国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需要众多这样的踏实研究为其增添养料,以期不断丰满、成熟。

本书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面对当前迅速发展的社会,语言也在迅速变化,一方面方言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不好或不会说方言;另一方面,普通话在日益普及的同时,也受方言影响,出现五花八门的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他们正覆盖全社会,成为中国的主体交际工具。加强对这些语言现象的研究,提供给相关决策部门,是对国家制定正确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

当然,新人研究新课题,总会有尚待完善之处。本书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弱势方言对强势方言的影响,究竟有何规律,还有待更多的探索。对无锡方言的研究,更是远未做完。这应是晓燕的未来目标。

若干年前,李荣先生曾谈到《方言调查字表》(简称《字表》)的价值,预言只有在方言濒于消亡,人们都不知道方言字音的时候,《字表》才会归于无用。我曾因此为《字表》的生存担忧过。但是,今天我认识到,这样的杞人之忧是不必要的。新的语言现象,自然会有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来应对。语言和语言研究永远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眼前的这本新著作,就代表这个方向。我相信,晓燕他们新一代学人会实现这一美丽愿景。

汪平

二〇一五年劳动节于苏州还读书庐

## 目 录

- 绪 论 / 1
- 一、语言接触的主要类型 / 1
  - 二、方言与标准语接触的相互变异模式 / 1
  - 三、语言接触的根本问题——有界还是无界 / 3
  - 四、变异理论和语言接触 / 4
  - 五、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 / 9
  - 六、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 10
  - 七、本研究概况 / 16
- 第一章 无锡方言的音系及其与普通话的结构差异 / 21
- 第一节 无锡方言音系 / 21
    - 一、声母(30个) / 21
    - 二、韵母(49个) / 22
    - 三、声调(8个) / 23
  - 第二节 普通话和无锡方言声、韵、调系统的结构差异 / 24
    - 一、表层差异 / 24
    - 二、深层差异 / 28
- 第二章 语言接触对无锡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 / 29
- 第一节 发音人情况和语料来源 / 29
    - 一、发音人情况 / 29
    - 二、语料来源 / 30
  - 第二节 声韵母的演变 / 31
    - 一、合并 / 31
    - 二、分化 / 40
    - 三、互相渗透 / 41

第三节 声调的演变 / 44

一、单字调概况 / 44

二、考察方向 / 46

三、单字调的重新考察 / 46

四、结论 / 58

第四节 无锡方言文白异读的演变 / 59

一、文白对立消失 / 61

二、文白对峙 / 62

三、新的文白对立出现 / 64

四、结论 / 67

第五节 以尖团变化为例考察影响方言变异的因素 / 68

一、无锡及周边地区区分尖团音的现状 / 68

二、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 / 69

三、影响尖团变化的语言因素 / 70

四、影响尖团变化的非语言因素 / 76

五、结论 / 85

第三章 无锡口音普通话的语音问题 / 87

第一节 调查方法和语料搜集 / 88

一、调查方法 / 88

二、语料来源和处理 / 89

第二节 无锡口音普通话的音类偏误 / 93

一、不同程度无锡口音普通话的音类偏误 / 94

二、从方言和普通话的音类差异考察音类偏误产生的原因 / 98

三、从中古音发展演变的角度考察音类偏误产生的原因 / 106

第三节 音值偏误 / 113

一、不同程度无锡口音普通话的音值偏误 / 113

二、从无锡方言和普通话的声韵调对应关系考察音值偏误产生的原因 / 116

第四节 音值缺陷 / 119

一、实验方法 / 119

二、单韵母 / 120



三、复韵母 / 134	
四、鼻韵母 / 136	
五、声调 / 146	
第五节 无锡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点 / 149	
一、偏误发展的动态性 / 149	
二、偏误发展的方向性 / 153	
三、偏误原因的多样性 / 154	
第四章 无锡方言变异和变化的原因 / 165	
第一节 语言接触对方言演变的影响 / 165	
一、普通话在无锡方言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 166	
二、周边强势方言在无锡方言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 171	
三、结论和启示 / 175	
第二节 无锡方言演变的内部原因 / 176	
一、语音系统自身演变的规律 / 176	
二、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 / 179	
第三节 语言态度影响语言演变的速度 / 181	
第五章 方言成分的强弱程度对语言迁移的影响 / 184	
第一节 方言成分强弱程度的连续统 / 184	
第二节 影响语言成分强弱程度的因素 / 187	
一、方言成分的稳定度与强弱程度的关系 / 188	
二、方言与普通话相应成分的相似性与强弱程度的关系 / 189	
三、语言成分的标记性与强弱程度的关系 / 191	
余论 / 196	
附录 / 199	
附录 1: 常用汉字调查表 / 199	
附录 2: 尖团调查 / 201	
附录 3: 单字调调查表 / 203	
附录 4: 无锡口音普通话语音调查材料 / 204	
附录 5: 无锡方言新老变化发音人情况 / 205	
参考文献 / 207	
后记 / 222	





## 绪 论

### 一、语言接触的主要类型

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与别的语言发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受到别的影响。可以说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一种动力,一种自然法则。近几十年来,由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综观语言接触的定义,多数是围绕不同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展开的,因此对语言接触的研究也分为两大阵营:方言接触和不同系属语言接触。

近20年来,语言接触成为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成为汉语方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民族语言学的关注对象。所谓的语言接触主要涉及三种类型<sup>①</sup>:

- (1) 外语跟本族语,比如英语跟汉语的接触。
- (2) 汉语标准语(普通话)跟方言的接触,或者方言跟方言的接触。
- (3) 口语跟书面语的接触。比如历史上文言和当时口语的接触。

其中汉语标准语(普通话)与地域方言之间接触的广泛性比其他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接触所无法比拟的。

### 二、方言与标准语接触的相互变异模式

变化是语言的本质特点。整个语言社会总是处于量变到质变再到量变的循环之中的,并在其中以人眼看不到的速度向前发展。汉语方言也不例外。如果说方言是社会分化的产物,那这种局面的维持一定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政

<sup>①</sup> 分类标准参考邵敬敏. 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6(6):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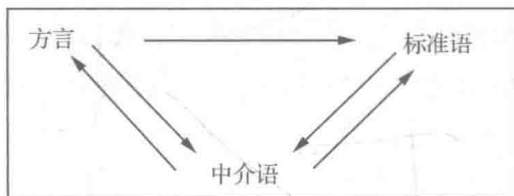
治的统一而被打破。随着交流的频繁,商贸往来的增多,人们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确保不同地区的顺利交际,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这就是标准语<sup>①</sup>。标准语的出现是经济政治集中的结果,因此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伴随的。

方言和标准语因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两者将长期共存并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由于方言和标准语共处于同一语言社会,必然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两者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各自发生改变,再加上外部因素的作用,其接触情况也就变得异常复杂。方言与标准语的这种接触现状已经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密切关注。如今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对此现象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方言和标准语的接触是语言接触中的一个特例。在语言接触中存在着源语(source language)和接受语(recipient language),两者存在一种转换关系。语言使用者对这两种语言中的一种一定会具有更多的知识,也一定会更熟练。

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如果这几种语言同时使用,就会发生借用、代用、夹用、混用、交叉、错位、嫁接,乃至产生两种语言要素交融的新型变体。这显然不是语言内部的发展所造成的,而是语言接触所造成的。标准语在扩展过程中会受到方言影响,产生标准语渐变体,方言使用者在习得标准语过程中其自身方言也会受影响,方言渐变体应运而生。

国外学者根据方言与标准语接触的现状,提出了两者的互动模式,即



上图显示方言与标准语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中介语,三者相互影响,

<sup>①</sup> 关于“标准语”的说法,参考徐大明《当代社会语言学》P176:“‘标准方言’的说法在西方比较流行,在汉语语言学界并不流行。一般社会上的看法认为方言是与标准语对立的。但是如果把方言定义为一种语言的各种变体,‘标准方言’就可以成立了。许多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一般所谓的‘标准语’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社会方言’。”我们跟各国的重大不同是,普通话是人为制定的,不是自然语言。这种情况大约只有中国有。所以人家说“标准方言”符合实际情况,但对汉语不合适。普通话是从方言中来的,但一旦成为普通话,就变成共通语言,不再是方言了。



在共时平面上呈动态发展的互动关系。但是作为变体,中介语并不是某个变体而是一个变体的集合,是一系列不同的变体,它们或是由方言使用者在习得标准语过程中产生的,或是由标准语使用者在习得方言过程中产生的,或靠近标准语,或靠近方言。方言与标准语接触后均发生改变,但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两者接触后各自的发展是不均衡的。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社会中使用两种语言变体,而且这两种变体往往是分别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C. A. Ferguson, 1959)就这种现象提出“双言制”的概念。他把用于正式场合的那种变体叫作“高变体”(high variety),另一种叫作“低变体”(low variety)。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无疑成了高变体,因为它有明确的规范,可作为书面语象征社会或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并且是通过教育学会的,使用的场合也比较正式。方言则是“低变体”,一般只在家里使用,仅存在于人们口语中。正是方言与标准语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标准语一经产生便要求方言向其靠拢,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受标准语的吸引更大,影响更广,方言的特殊成分越来越少,方言中有活力的、表现力强的部分将会融入标准语中,标准语在吸收了方言中的有益成分后变得日益丰富与完善,方言与标准语在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中向前发展。但是方言作为使用者的母语往往是第一习得语言,自然是根深蒂固,相当精通熟练的。在掌握和使用双语时,第一习得的方言对第二习得的标准语必然也会产生较大和较直接的影响。

### 三、语言接触的根本问题——有界还是无界

随着19世纪殖民主义的疯狂扩张而出现的语言融合的加剧和混合语的产生,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首先把眼光转向混合语(creole, 克里奥尔语)、区域类型学的研究。两者都涉及语言接触的根本问题:语言接触是无界还是有界的?即语言影响只是词汇借用,还是涉及语音和语法层面?

对此问题的回答大致分为两大阵营:有界和无界。有界接触观把语言接触有界性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语言内部结构因素,而无界接触观把语言接触无界性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

以鲍阿斯(F. Boas)、梅耶(A. Meillet)、萨丕尔(E. Sapir)、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雅各布逊(A. Jakobson)、马丁内(A. Martinet)、魏茵莱希(U. Weinreich)为代表的有界论者,他们着眼于从语言内部结构来讨论语言的接触,认为

语言的形态部分和音系部分不会受接触的影响(彭嫵,2007:140)。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产生与印欧语言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有关,后来也影响了一大批学者。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特鲁别茨科依(N. S. Trubetskoi)用同构和对应确定同源关系的原则提出质疑。他通过对乌拉尔语系的西芬兰语和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的比较,认为同构和语音对应规律既可解释为同源关系,也可解释成语言联盟或语言接触关系,语言接触没有界限,语言影响虽然最常见的结果是词汇的相互借用,但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相互渗透。

而以托马森(S. Thomason)为代表的无界论者,则从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接触中找出了语言系统各层面受影响的材料,并把接触程度的深浅归结为社会因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接触被看成是随机的碰撞,结构因素不起任何作用。

陈保亚(1996)在研究语言接触的时候提出“无界有阶”的观点。他根据对傣语和汉语的接触进行的追踪研究,认为语言接触是一种互协的过程,即两种语言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互协的过程则呈现出无界而有阶的特点。“‘无界有阶性’是语言接触的根本属性。接触可以深入到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这个‘度’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接触时间、双语方向、双语人口决定的,但是度的演进是有阶的,这个阶是由结构因素决定的。因此接触的无界有阶性是由社会因素和结构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仅仅考虑到社会因素,就不可能观察到结构的阶,而把语言接触仅仅看成是没有结构、没有层阶的随机碰撞。如果仅仅考虑到结构因素,就会无视干扰和借贷的度,形成接触有界的观念。”这是陈保亚的创见。所以,语言的演变既有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二者交融在一起推动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既有轻度的或表层的影响,也有重度的或深层的影响。尽管接触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各个层面接触的深浅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语言中的接触具有不平衡性。

#### 四、变异理论和语言接触

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是它的社会性,所有被研究过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包含着语言变异。语言具有纷繁变异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必然存现于纷繁变异的社会组织之中。继承索绪尔的语言属于社区的观点,变异学派的社会语言学家总是以言语社区为基本研究单位。实际上言语社区这一概念应用到现实世界中是有相对性的。现实中是一种多层嵌套的



情形。比如江苏无锡人认为合乎普通话语法的现象不一定是北方人都接受的现象。有几个人开始尖团不分不代表所有无锡人都开始尖团不分了。没有外部的参考标准,任意择取一部分语言现象很难确定是否代表全部。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Hudson, 1980)提出一套很有用的概念系统来描写语言的变异性特点。其中核心概念是“变体”(variety)。

语言的变异有的跟地域有关,有的跟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有关,有的跟使用场合有关。既然每一种语言都有很多变体,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选择某一种变体呢?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将两个概念引入社会语言学:权势量(power)和共聚量(solidarity)。Brown & Gilman(1960)、徐大明等(1997:97-98)认为语言的使用反映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选择哪一种形式就取决于说话双方的“权势量”和“共聚量”。每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不同,因而每一个社会的“权势量”和“共聚量”的绝对值都不相同,即使同一社会不同时期,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也会不同。比如在推广普通话以前,沪宁线上上海话的影响很大,人们并不会迁就“北方话”的人。但如今普通话一统天下,上海话的优势地位让位给了普通话,一般当地人跟外地人打交道都会尽量使用普通话,哪怕说得不标准、说得很吃力。这些都会给语言演变的方向造成影响。

传统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一个单一的抽象符号体系。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个人的语音、词汇、语法也都不完全相同,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语言差异。拉波夫曾经通俗易懂地把语言变异定义为“表达同一事物的(交替出现的)不同说法”。语言变项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环境而异。知道了一个人的社会特征,就可以预测他会选用哪一种语言变式;同样,知道了一些人常用哪些变式,就可以推测说话人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社会特征。

帕普拉克(Poplack, 1993)将语言接触现象基本分成以下几种:语码转换、词汇借用、不完全的第二语言习得、干扰、语法融合、语体简化、语言死亡。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现象之间并不都是界限分明的。

例如“语码转换”,帕普拉克认为语码转换是在连续讲话中出现不同的语言的句子或句子片段的现象。对于语码转换基本上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语码转换现象充分反映出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说明人们掌握了两种语言后能够根据对象、场合、话题等因素来进行选择;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不完全的

语言习得的结果,是不能够纯正地使用一种语言的表现。这两种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看到。比如两个无锡学生下课后在用无锡方言聊天,看到他们的老师过来,因这老师不会讲无锡方言,他们立刻转换为普通话跟老师交流,这就是前一种情况。而方言区的人如果在讲普通话时无法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借助方言的词汇或句子,就属于后一种语码转换现象。反过来也一样,人们在讲方言时遇到一些非本地区常见的新事物或新概念时也会借助普通话的表达形式。在符合标准的语码转换现象中,还可以分出不同结构层次的转换现象,有“句间转换”“句内转换”以及附加语转换。很多人讲普通话时会尽量避免使用“阿”字句,但在附加问中往往会“露出马脚”,即在讲完一句陈述句后,加上“阿是?”“阿对?”这类的附加成分。这就形成了普通话向方言的语码转换。

词汇借用可以是历史上借入的词,也可以是“一次性借词”。一次性借词这种语言接触现象既可以是一种个人现象,也可以是一个社团范围的常规交际方式。

语法融合是一种比较持久性的现象,在比较稳定的双语社区内经过长期的语言接触之后才会产生。比如无锡人在讲普通话时遇到对过去事件的提问时,经常使用“有没有VP”这样的结构。同样,无锡方言里双宾语句中接受者在后的句式日趋式微,这明显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不完全的二语习得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区范围的现象。语言的掌握情况总是要受到学习和使用这种语言的具体环境的限制,而对于大多数接触双语的人来说,学习和使用不同语言的环境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实践中,完全平行地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完全平衡的个人双语发展和存在环境也很难找到。第二语言的使用范围的局限性也会影响这种不平衡的双语能力的表现。

干扰是指两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各方面相互干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彼此的语言成分,有时两种语言产生混合(徐大明,等,1997:166)。干扰有个别性和偶然性。而不完全习得产生的结果可能“僵化”。

语言简化则是长期的语言使用范围受到局限的结果。再往后发展就是语言死亡。

这几种语言接触现象在方言和标准语的接触中都存在。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发现,与语言变异最明显相关的社会因素是性别、年龄、



社会阶层、民族和种族。

男女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生理上说,男女就有差别,女性的声带比男性短,声调比较高。更重要的是男女在语言上的差别是社会造成的。语言变异的定量研究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性别差异现象。例如拉波夫在研究美国方言语音变化时就发现女性在所有被调查的社团中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传统上认为女性总是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变体和标准变式。但是在非西方工业国家的调查中发现过完全相反的情况。如讲普通话时,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AP 得不得了”“AP 死了”这类带方言味儿的程度表达方式。此外也曾发现过没有表现出趋向性的性别差别的语言现象。这在方言口音普通话和方言变异中都能找到很多例子。最近的研究发现,所谓的性别差异与语言的关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虽然人的性别生理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种种语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性别观念出发来理解语言现象并不总是能够反映社会现实。

不同年龄的人说话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不管是说普通话还是说方言都可以看到这种差别。但这种差别要分清是代差(*generation difference*)还是年龄级差(*age grading*)。所谓代差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之间的差别,代差曾被用来解释语言的变化;年龄级差指同一代中间不同年龄的人之间的说话差别。代差可以通过几代人的语言特点反映一个语言变体的发展趋势;而年龄级差则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变异,如“女国音”体现一代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对某些语言变式的使用所产生的变化。要区分进行中的变化是代差还是年龄级差,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真实时间的证据。由于进行重新调查存在实际性困难,社会语言学的真实时间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少。但是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变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一些早期的调查到现在也达到了相当的时间距离,从而构成了检验变化的客观条件,在这种形势下,社会语言学对变化的真实时间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起来。如在拉波夫 1962 年的纽约市百货公司调查后的 24 年,傅乐(Fowler, 1986)采用了与拉波夫同样的方法在相同的调查区域调查了相同的语言变项。荷曼(Hermann, 1929)在高莎(Louis Gauchat)调查 30 年后重新调查了有关语言变项。丝德良(Cedergren)在 1967—1971 年和 1983 年两次对巴拿马城西班牙语的五个变项的社会分布情况进行调查。在中国,徐大明在 1987 年运用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调查了包头鼻韵尾的变异情况,15 年后他的学生祝晓宏对同一个言语社区鼻韵尾的变异情况进行了再调查。调查发现:鼻韵尾变



异的情况 15 年来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包括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在内的环境因素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制约条件,原来的制约条件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徐、祝的调查也显示,没有真实时间证据的情况下,只依靠显象时间的资料来区分进行中的变化与年龄级差变异是困难的。

社会阶层因素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更多地体现在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上。《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显示,从教育背景来看,受过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能说普通话者在同一学历层次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56.08%、75.76%、86.77%。这组数据基本显示,普通话的习用效率和受教育程度维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

上述的这些社会因素也可以用于解释同一方言区的带方言味普通话所呈现出的一种层级性。从年龄上来说,方言区的成年人,如果从小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普通话训练,在说普通话时往往会受方言影响,会在语音方面出现错误;在词汇和语法上往往会有意识地同普通话对应,尽量避免错误,而语音却无法一时纠正过来。而年龄越小的人,接受普通话教育越严格,由于发音习惯尚未形成,一般来说,他们的普通话语音会相当标准,但在词汇、语法方面由于受当地方言习惯说法的影响,会较频繁地出现方言词汇、语法,从而与标准普通话产生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少年儿童知识储备不够,无法有意识地将已经习惯的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结构转换为与普通话对应的普通话词汇和普通话语法结构。从性别上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接受第二习得语言的能力要比男性强。但在某些项目上男性更接近标准。文化教育程度及职业的不同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级别的带方言味的普通话。这种水平上的差异跟说话人所受教育的程度有很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在我国大多数方言地区,学校教育是当地人掌握普通话的最重要的途径。文化程度高的居民的普通话受方言影响的程度要比文化程度低的居民受方言影响程度小。而文化程度又跟职业有一定的联系,不同职业的人说普通话的状况又有所不同,比如教育界的人士(包括大、中、小学教师)一般要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士(电台和电视台主持人除外)普通话水平高。陈松岑(1990)分析描写了绍兴市城区普通话五个等级的语音特征,这五个等级说明绍兴市城区居民的普通话受方言影响的程度。等级数字越小,表明其普通话受绍兴方言的影响越小,越接近标准的普通话;等级数字越大,表明其普通话受绍兴方言的影响越大,离标准普通话也越远。陈松岑还指出,使用一、二级普通话最多的是教育界,其次是各种服务行业,再次是机关干部,使用最少的是工





人。这和职业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以及交际中使用普通话的需要大小有关。

本文的主要议题就是语言变异,不管是研究不纯的方言还是不纯的普通话,都不能脱离上述因素孤立地看问题。

## 五、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除了有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接触现象之外,各地方言之间的接触、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也是广泛存在的语言接触形式。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属于前面提到的方言和标准语的接触。语言接触的各种现象几乎都能在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中找到。

一般来说,第一习得语言作为讲话者自己的母语自然是根深蒂固,相当精通和熟练的。在掌握和使用双语时,第一习得的语言对第二习得的语言会产生较大和较直接的影响。就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情况而言,方言是人们第一习得的语言,普通话是第二习得语言,方言和普通话“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虽不用像学外语那样一字一句地学,而是可以参照方言类推地学,但仍然会受到方言的干扰或者叫负迁移。所以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各地方言甚至个人习惯都会对普通话的掌握和使用产生影响,使普通话在实际运用中产生各式各样的变体,形成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可以说,百分之百纯正的普通话是不存在的。虽然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是北京地区的居民所说的话也并非纯正的普通话,有人称其为京味普通话。所以说普通话的规范程度是相对的,它只能是指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我们国家目前两者并用的状况实际上也就是地域方言与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并存并用的状况。带方言口音普通话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层次,往往是语言几个方面不合标准、不合规范的综合体现。一个人说普通话时,如果语音错误较多、方音较重的话,一般情况下词汇和语法方面也会有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反过来,情况就不同,目前在大中型城市长大的居民在普通话的发音方面多数没有很大问题,而在词汇、语法方面往往露出“乡音”来。这样,对于一个人的来源地,我们不仅可以从他说的方言而且可以从他说的普通话猜个八九不离十。

跟北方口音的普通话相比,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容易出现错误,而三者之中尤以语音最为突出,因为南方方言的声韵调系统与普通话差异较大,与普通话之间的对应也比较复杂。在语流音变方面,北方方言有轻声、儿化;而南方方言多数没有,受此影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基本上